

广东与中西部经济联系的形式 和实质探析^{*}

兰宜生

广东地区因为拥有地缘、人缘和先行开放政策等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吸收了大部分进入我国的外商投资。由于国家对外资企业产品出口的强制要求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领域。由于大量外资流入广东,广东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吸收了大部分广东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地区开始形成对外省劳动力的需求,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中西部人口大省自然成为输出劳动力的主要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以劳动力流动为基本纽带的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特定经济关系。

一、广东地区外来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20世纪80~90年代,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持续流入对支撑广东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满足了广东地区生产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了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又保持了广东地区劳动力低成本和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统计资料来看,直到90年代末,广东地区的外来劳动力供给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应是最低数字,估计有相当部分外省民工因劳动力的流动性、临时性、短期性未进入统计),1994年广东省新增外省劳动力达66.4万人,年末实有外省劳动力达到343.6万人;1999年新增外省劳动力达92.9万人,年末实有外省劳动力达到464万人,1994~1999年增长幅度达25.9%。与此同时,来自省内的流动劳动力(指各市县间流动、就业的本省劳动力)总量呈下降之势,1994年末有301.5万人,1999年降到225万,1994~1999年间下降幅度达25.4%^①。外省劳动力人数与省内流动劳动力人数之比,由1994年的1.14:1上升到1998年的2.06:1。这种变化趋势说明,省内劳动力资源已无法满足广东经济发展的需要,广东越来越依赖输入外地劳动力。

二、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利不等利的经济关系

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源源流入,满足了广东地区企业扩大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抑制了广东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维持了广东地区外商投资的利润率和出口竞争力,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更大的需求。外商投资的

^{*} 本研究得到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0SJA790007)。

^① 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0)第110~112页计算得到。

增加、广东地区出口规模的扩大和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

在“外商—广东—中西部”的经济关系中，外商获得了投资利润，广东地区因其出口产品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获益，中西部地区则获得了输出剩余劳动力的收益，三者之间形成了“三赢”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利益分配是不平均的，就地区而言，是“东多西少”。这成为广东地区与中西部省(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

广东获得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出口产品成本降低，出口竞争力提高，出口规模扩大，出口利润增加；出口规模的扩大刺激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也必须看到，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仅迫使企业自觉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迫使政府部门不断提高自身的办事效率，改善社会环境，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此外，中西部地区的民工在广东的生活消费也扩大了当地的市场需求，增加了当地的经济产值和财政收入。

中西部省(区)从劳动力输出中获得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外出民工汇款提高了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同时，也减轻了失业压力；但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因本地区缺乏人力资本积累和外部资金注入，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新兴产业薄弱，市场经济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和完善，经济活力和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三、有关实证分析

为验证笔者关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互利不等利经济关系的假设，2000年7~8月，笔者依靠汕头大学商学院暑期回家学生的帮助，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问卷调查。调查地点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14个地级市，占广东全部22个地级市的2/3；所选企业均为外商投资出口企业。调查对象是来自中西部省(区)的民工。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消费、汇款、供养人数、家庭总收入、家庭所在地等数据。总共发出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2份，占发出问卷的85.3%。接受调查的民工分别来自黑龙江、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12个中西部省(区)。

(一)中西部地区民工在广东的收入水平

对问卷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本在家乡做工或务农的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3.23倍，由144元提高到611元；每个民工平均每年往家汇款2606元，占家庭年总收入的28.7%（见表1）。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广东，不但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而且对增加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收入有显著效果，对提高中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二)外来民工与本地职工的收入比较

虽然纵向比较外来民工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但与广东本地职工收入做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外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与本地职工有明显差距。笔者以2000年《广东统计年鉴》中“1999年各巿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参照，与调查样本中14个城市的外来民工平均工资做一对比，结果发现，各巿外地工人的平均工资均低于本地职工平均工资，前者分别相当于后者的46.53%~98.2%，平均相当于本地职工平均工资的74.55%（见表1）。在被调查的外来劳动力样本中，除大部分人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的工人外，也有一些人是从事管理工作或专业技术工作的

(少数人有本科或专科学历), 因此, 这一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本地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具有可比性的。

表 1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广东地区的劳动收入及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 元, %

城市	月收入	本地月工资水平	相当本地工资比重	外出前月收入	前后收入比	年汇款	家庭年总收入	占家庭收入比
广州	811	1389	58.39	94	8.63	3739	9274	40.3
深圳	805	1726	46.64	143	5.63	3748	7677	48.8
珠海	807	1273	63.39	94	8.59	2343	11214	20.9
惠州	665	740	89.86	208	3.2	2673	9650	27.7
汕头	663	815	81.39	204	3.25	2738	9990	27.4
潮州	539	575	93.74	196	2.75	2847	8845	32.2
揭阳	547	557	98.20	205	2.67	2049	9370	21.9
东莞	553	1046	52.87	161	3.43	2074	8200	25.3
中山	489	1051	46.53	104	4.70	2110	8500	24.8
佛山	903	929	97.20	97	9.31	2576	10433	24.7
茂名	450	578	77.85	150	3.00	2375	6000	39.6
汕尾	586	691	84.80	127	4.61	2506	10147	24.7
清远	586	637	91.99	119	4.92	2861	8195	34.9
河源	450	577	77.99	120	3.75	1850	9500	19.5
平均	611	899	74.55	144	4.23	2606	9071	28.7

注: 根据 2000 年 8 月笔者在广东 14 市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整理。

鉴于外来民工社会福利待遇甚低, 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隐性收入几乎为零, 货币收入即是其全部收入, 外来民工与本地职工在全部工资福利收入方面的差距则会更大。因此,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入对降低广东的劳动力成本, 提高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是有重要作用的。

(三) 外来民工的消费水平

从表 2 列出的外来民工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看出, 外来民工在广东地区平均每月个人消费 346 元, 若以广东省最少有 600 万外来民工估算^①, 则外来民工每年在广东的消费额达 249 亿元, 占 1999 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 7.3%, 相当于广东省 GDP 的 3%。^② 外来民工的平均供养人口为 2.86 人, 其中, 一部分供养人口也是在广东生活和消费。因此, 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劳动力在广东的就业和消费, 不仅降低了广东地区的劳动力成本, 而且增加了该地区的消费需求 and 市场购买力, 扩大了当地的经济规模, 对促进广东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无疑有重要作用。

① 这是广东省官方的估计, 见《广东统计年鉴》(2000), 第 26 页。

② 以上数字均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0) 计算。

表 2 在广东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个人及家庭状况 单位: 元

城市	平均 年龄	教育 年限	务工 年限	月 收入	最高月 收入	最低 月收入	每月个 人消费	供养 人数
广州	25.5	8.1	6.00	811	958	361	350	2.8
深圳	26.0	8.0	5.27	805	969	388	373	4.6
珠海	25.3	9.4	6.71	807	993	511	543	3.3
惠州	25.7	9.6	5.45	665	906	515	398	2.7
汕头	26.7	8.9	4.57	663	894	452	321	2.7
潮州	27.0	6.7	3.20	539	713	353	312	3.5
揭阳	29.3	8.2	6.00	547	764	361	303	3.2
东莞	25.2	9.2	3.30	553	660	417	333	2.4
中山	23.7	8.5	2.70	489	734	360	307	2.5
佛山	29.0	11.5	5.30	903	1041	558	583	2.8
茂名	30.5	8.3	7.50	450	950	225	313	2.3
汕尾	27.2	10.6	4.90	586	616	505	346	3.9
清远	22.6	8.4	4.40	586	699	509	216	1.9
河源	24.8	9.7	3.50	450	562	375	300	1.5
平均	26.3	8.9	4.91	611	797	421	346	2.86

注: 根据 2000 年 8 月笔者在广东 14 市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整理。

四、广东省与四川省的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观察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利不等利的关系, 下面把主要劳动力输出省份四川与广东做个对比。

四川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 获得了可观的民工汇款收入, 估计每年超过 100 亿元, 但与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因外资增加、出口扩大而获得的经济增长利益相比, 两省显然是不相等的, 两省的经济差距也因此日趋扩大。1980 年, 四川省 GDP 产值列全国第一位, 经济增长速度排在全国第四位; 而到 1999 年, 四川省 GDP 已降到国内第 10 位, 经济增长速度落为全国倒数第一位。^① 广东省 1953 ~ 1978 年 GDP 年均增长率不过 5.1%,^② 属于全国中等水平, 而 1979 ~ 1999 年保持了年均递增 14% 的高速度,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464 亿元, 高居全国第一位。1978 年, 广东省人均 GDP 为 365 元, 四川省人均 GDP 为 260 元, 四川省相当于广东省的 71.2%; 到 1998 年, 广东省人均 GDP 达到 11130 元, 四川省人均 GDP 为 4339 元, 四川省只相当于广东省的 38%^③。

广东与四川经济的不同表现与两省的经济开放水平差异有直接关系。广东的外贸依存度高居全国首位, 1998 年为 136%, 1994 年最高时曾达到 184%; 而四川 1998 年为 6.6%, 1994 年也只达到 10.3%。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广东的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保持了广东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对外贸易的超高速增长带动了广东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1979 ~ 1999 年广东省进出口年均增长 22.6%, 比全国增幅高出 8 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份额由 1978 年的

① 林凌、刘世庆:《四川与中部省区的差距与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00 年第 2 期, 第 5 页。

② 林凌、刘世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6 月, 第 1 页。

③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 590、614、697 页的数据计算。

14.3%上升至1999年的38.9%；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的位次，从1986年跃升首位，已连续保持15年；进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6143，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1999年，广东省进出口总额与GDP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86，其中，出口与GDP间的相关系数为0.9913。外贸、特别是出口，对广东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有的学者计算了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含对外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额，80年代平均为1.3%，1990~1999年达到8.5%^①。而四川1998年进出口贸易额为28.5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6.75亿美元，进口额为11.84亿美元，均只相当于广东省的2.2%；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7亿美元，只相当于广东省的3%。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能否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分享现代科技成果，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广东的贸易结构也有自己的特点。1999年，机电产品出口额达38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9.7%，制成品已占广东出口产品的95%^②，其中，又以加工出口为主，而且技术层次逐年提高，加工环节增加，其国内的增值水平和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都明显提高。1990~1999年，当期来料加工贸易增值水平 $[(当年出口/当年进口)-1]$ 由21%提高到52.2%，当期进料加工贸易增值水平由33%提高到38%。在广东，加工和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使纺织、机械和电子工业等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加快了广东地区工业化的步伐和产业结构转变的速度，增强了该地区的工业实力和一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四川出口产品中农副产品仍相对占有较高比重，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形成的“政策洼地”，促成了广东地区吸引外资和人才要素的优势地位，使广东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迅速扩大，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显然，外资和外贸已成为广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使该地区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而四川省等中西部省(区)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为广东经济的这种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使其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四川省虽然获得了劳动力输出收益(主要是民工汇款)，但该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低，资金和技术短缺，以及市场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四川地区的经济转型，使四川地区未能形成经济积累增长的良性循环，因而与广东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因此，以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纽带的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实质上是一种互利不等利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是形成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

五、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得到出口退税利益的差别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入支撑了广东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按照我国的增值税分配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增值税收缴后中央与地方是三七分成，而出口退税款却全部由中央财政支付。这种税制安排有利于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事实上是少交多退，用中央税款鼓励本地出口。因此，出口退税也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这一政策有利于出口规模占我国绝大比重的广东和其他东部省(市)，而不利于出口规模小得多的中西部地区。

以1998年为例，东部出口756亿美元，占全国的41.1%^③，如果按一半比重估算一般贸易

① 转引自《广东统计年鉴》(2000年)，第24页。

② 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0)第482页的数据计算得出。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592页的数据计算得出。

出口额,按 14%估算平均退税率,按 8 元人民币估算出口换汇成本,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成按 7:3 计,广东出口退税年收益为 63.4 亿元(退税净收益=756 亿美元 \times 8 \times 50% \times (14%-17% \times 0.7));中部地区出口额 123 亿美元,退税净收益为 10.4 亿元;而西部地区出口额 56 亿美元,退税净收益为 4.7 亿元。若按人均出口额计算则更直观,广东人均出口额 1062 美元,可得退税净收益 90 元;中部人均出口额 28 美元,可得退税净收益 2.4 元;西部人均出口额 20 美元,可得退税净收益 1.7 元。

表 3 1998 年广东与中部、西部出口额及退税收益(估算额)的对比

地区	实际出口额 (亿美元)	估计平均退 税率(%)	退税额 (亿元)	人均出口 额(美元)	人均退税 额(元)
①广东	756	14	63.4	1062	90
②中部	123	14	10.4	28	2.4
③西部	56	14	4.7	20	1.7
①/②			6.1		37.1
①/③			13.5		52.9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和设定数值计算。

从表 3 可以看出,由于广东省与中西部地区出口规模相差很大,获得的退税收益相差悬殊。广东获得的出口退税额是全部中部省(区)的 6.1 倍,是西部省(区)的 13.5 倍;若以人均退税额来看,广东人均退税额是中部的 37.1 倍,是西部的 52.9 倍。因此,对外开放度高和出口规模大,不但拉动了广东省产业的升级,提高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还通过出口退税机制每年从中央财政中获得了超过中部和西部近 50 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增加了本地的资金积累和资金供给。

六、结论和建议

1. 重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创造制度条件。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广东,实际上反映了广东与中西部的一种二元部门关系,是双方经济联系的基本形式和纽带。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持续流入广东,降低了广东的劳动力成本,维持了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成为吸引外商不断扩大投资的重要动力。外出民工吸收的技术知识和市场经济观念,会转化为人力资本要素,再加上劳动收入,这既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要素结构,也减轻了中西部地区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同时,外出民工也为广东经济的起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政府要积极引导、合理调节跨省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减少盲目流动的成本,但不能歧视和片面限制。

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影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地阻碍着城市化和我国服务产业的发展。因此,应逐步放松以至取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或异地进城就业和定居创造条件。

2. 重视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作用。由于贸易在积累资金和扩大市场方面的特殊作用,扩大贸易规模、提高对外开放度对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西部地区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集中资金投资于贸易潜力大的产业和地区,以便尽快形成资金积累和互动发展机制,同时,也要重视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西部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地位上已处在低梯度地区,

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应是对内、对外同时开放,既要重视扩大进出口,也应重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互补贸易和产业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与东部地区的产业之间形成比较紧密的产业衔接。

3. 中西部地区必须加快制度创新,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体制条件。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最大阻碍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办事效率低,且目前仍保留着许多限制商品流通的“土政策”,再加上人事制度落后、财政能力薄弱、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等,从而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削弱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其他优势。

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其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同时,还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为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发展创造体制条件。这对吸引人才回流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流到广东等地的打工者已积累了经验,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金,建立了市场关系。企业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合理的经济机制是他们组织和利用各种机会和资源的基础因素。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创造条件吸引这些外出打工者回到中西部地区去创办企业,这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借鉴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关系的作用,建立“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对我们是一个启示。中西部地区应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突破口和增长点,主动促成或建立“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区域内的经济落差,使沉淀的资本、劳动力要素流动起来,流向发展条件好和回报率高的地区,产生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应让有条件的城市率先走上良性循环的快速发展轨道,提高整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再通过这些本地“发展极”的近距离辐射作用,通过资金、技术、人员、商品的双向流动,带动周围不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实行倾斜发展政策是为了提高有限的资金、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创造比分散使用这些要素更多的财富,这样才有能力支持和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用较短的时间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王洛林、魏后凯:《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思路与发展前景》,《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3期。
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3. 鲁舟、陆跃祥:《西部地带扩大对外开放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4期。
4. 蔡昉等:《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5.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
6.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1985~2000)。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慧敏)